

蓦然回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深

自省

新

扬弃

殊

奋进



刘锋杰 著

蜕变与回归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对抗

6.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特约编辑 董炳月
封面设计 卢 宏
装帧设计 黄耀子
责任校对 孟 固

蜕变与回归

刘峰杰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学海计算机排版中心制版

北京通县兰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20 千字

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276-1 / C · 39 定价: 2.70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时，西方学者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正是许多学者在猎取西方思潮之际所不断触发的共同感受。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名为“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大型系列丛书。该丛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文化现象放到世界文化或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丛书的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还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为中国

的四化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丛书面向积极投身于改革和十分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类青年、大专院校学生、各类社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社会读者，海外华人世界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关心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士，力求观点正确，富有新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意新文美，将是丛书的重要特色。全部丛书均由近年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编写，由我公司分辑陆续出版。

总 序

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又都泛起革故的悸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同时又不愿失去龙的传统人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

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

然而我们也想说——

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血管里，跳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积沉着长期停滞时的糟粕。跳动的要升华，积沉的要歇息。升华的要给予动力，歇息的要加以刺激。

我们想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揭触其底层奥秘；我们想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的陋网，痛诋其情性积习；我们想向世界展现瑰丽，重新塑造炎黄子孙的

形象；我们更想为国家的繁盛和民族的腾飞，歌而舞，鼓而呼。

然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想，只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昨天，我们还被称为早晨的太阳，今天，即可为万里晴空辐射热量。也许某一时刻，会有云，把我们遮掩，但我们坚信：只要有光明，中华就有希望。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丛书编辑委员会

引言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以其军事实力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之间对抗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对抗史。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继续闭关锁国，彻底抵抗外来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或者奉行开放政策，痛苦地接受西方文化精神。全部近代史的悲剧在于：中华民族在其军事对抗上的不断失败，虽然促使了一部分人觉醒，形成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队，但并没有促使它的全体成员充分认识到他们在文化对抗中终将失败。中华民族的大多数臣民，不是陷入自欺，在幻想中征服着入侵者，就是养成敌视西方文化的仇视心理，将一切外来品(物质的、精神的)视作洪水猛兽。因此，军事失败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震动，但又确乎没有再震动它那恒久而宁静的心灵。中国文化陷入发展与生存的困境，但它在困境之中又似乎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怡然自得，丧权辱国的劣势不是削弱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相反，这种自信心却十分荒唐地膨胀了，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教之光，应当照耀被它视为蛮夷的一切地方。所以，近代史上才有虽然战败却依然要求胜利的进见者行跪拜叩见之礼的君主。一个斯文扫地的臣子，却大谈外国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有一个商业凋敝生活贫穷的国家，硬说天朝无所不有……

因此，尽管近代史上出现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和开阔的世界认同感，推行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但是它们都未取得预期成功。历史所产生的激情与活力，又被历史吞噬掉。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象一柄巨

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人民的头项。中华民族渴求的西方真理，却是威胁它生存的魔力。从渴求真理的角度看，它应与这一真理认同，在这真理之火中蜕变新生。但是这一真理又无疑太炽烈，太无情，炽烈、无情到疲惫羸弱的中华民族难以经受。于是，是选择痛苦的蜕变，还是选择完整的延续，一直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两难抉择。应当承认，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曾为打破这一历史悖论作过努力，并且摆脱过这一悖论，在某种程度、某个历史瞬间背向传统，走向世界。但是，洋务派与维新派本身又不具备完全跳出这个历史悖论的力量。洋务派生不逢时，在小农经济的荒漠沙海之中，现代的商业意识，大生产设想，科学立国的蓝图，恰如细细涓流，会被完全吸干。维新派与传统的关系还太密切，康有为和梁启超由变革到保皇，说明他们还无法完全斩断自己与传统的情感联系。因此，洋务派和维新派具有摆脱这一历史悖论的某种姿势，可在实践上又必然不能实现。时代没有让他们放足，而最初的放足者也终难成为天足。而传统文化，则凭借小生产方式和近代中国先觉者们的妥协性，寻找到了十分合适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改变近代中国文化面貌的是五四。五四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为其鲜明特征。它的彻底性集中体现为“打倒孔家店”这一伟大口号，规定中国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孔学儒教，成为它痛加批判的对象。第一次深刻剖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疲惫羸弱状态。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未结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一条十分准确清晰的路途、为未来中国提供一幅准确清晰的图画，但是它对青春中国的呼唤，对怀疑精神的弘扬，对一切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宽容与吸收的态度，对于个性的确认，却又实实在在构成了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新起点，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划出

了一条光芒四射的分界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那里，几难找到对于传统的留恋，而这一点，也就同样程度地感染了整个进步的思想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比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以西方文化为坐标，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不可否认这里可能有着盲目性、简单性、片面性，中西文化作为两种价值系统，各自具有自身的质，当我们从一种文化的质出发，去估价另一种文化的质时，可能会犯张冠李戴、越俎代庖的错误。但是，中西文化又是可比的，黑眼睛蓝眼睛分不出亮与暗，黄皮肤与白皮肤同样有美人，中西文化由于同是关于人的学说，在是否更有利于人的发展上可以分出高下，辨出优劣。所以说，五四的方法又是可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中国人的温柔富贵乡，而是中国人的普洛克儒斯咸斯的魔床。这来自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压迫的暂时放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五四的结论，既大胆又正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勇敢地选择了痛苦的蜕变这条路，才代表了中华民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进步，跳出了那个既困扰洋务派又纠缠维新派的历史悖论。五四的光辉，功绩和魅力，正在于斯。

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超越性的原因多种多样，诸

如当时的反帝斗争暂趋缓和^① 封闭的中国正被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所蚕食，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中的任何一个原因，都会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活力、以推动。不过，能使五四成为一场文化运动而非一场政治运动，着眼于民族反思而不着眼于民族反抗，则主要得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清晰地看到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区别，看到了民族反思是民族解放的基础，人的改造是一切其他改造的先决条件。所以《新青年》将自己的“天职”放在改造青年思想和提高青年修养上，愿意“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② 鲁迅才首先解剖中国人的人格，告诉人们：“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③ 周作人才完成思想的转变，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主张从本民族做起，争到世界公民的位置。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一条宽阔、深刻的思路上，形成了讨论思想改造、改变民族心理，完成中国人的人格重塑这一基本母题的。

然而现代中国社会并未为它的顺利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比较中国近、现代史可以看到，近代史上，制约传统中国走向世界、获取现代意识的诸多矛盾并未消失，甚至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强化了、膨胀了。与洋务派的不成熟相比，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只是一个未及成年的软弱少年；与封建的君主统治相比，共和政体始终与独裁相伴。残酷的党派斗争最终还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上去。在这里，最

①这来自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压迫的暂时放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和面粉业，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②《一九一六》，载《独秀文存》。

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根本的是保国保种的救亡活动冲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辛勤培育的观念，又复活或创造了一套与救亡现实相适应的观念和理论。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以开启“民智”的时间，也没有给广大人民以时间来更新思维。结果，在双方的匆忙结合中，知识分子丧失了参与建设现代文化的主导地位。在中国现代史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恰如一把饱满的绿豆，被放入一个瓦瓮，非但不能开花结果，自身也只能长成一团乱蓬蓬的豆芽，根浅茎长，纤弱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部现代思想史是以五四开始的，但全部现代思想史的真正历史内涵，却是被五四解开的历史悖论的并不迟缓的闭合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就极为复杂曲折，且以不断耗损其走向世界的能量、胆识而逐渐向传统回归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后来人的话题，特别是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的话题，正是因为它本身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给人以遐想，叫人去沉思。

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上产生的。文化冲突必然构成它的重要冲突之一。对于这种冲突的梳理与反思，是本书的宗旨，而完成下列论述，则是本书的既定任务：

(1)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宣扬过世界主义，但它在什么情况下彻底转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且将民族改造与民族解放两个主题的历史地位作了颠倒置换？

(2)中国现代文学梦想过一种新的人——现代人出现，结果，阴错阳差，鬼使神差，又是什么使它放弃了这种追求，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培养无个性的人，让个体在群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3)知识分子代表精英文化，农民阶级代表农民文化，是精英文化服从农民文化？还是农民文化服从精英文化？中

国现代文学有两种回答，两种选择，于是也有了两种结果。对此如何评价？

(4)艺术、美，历来是自由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追求与此不悖，那么为什么它又选择不自由的模式？其收效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是优是劣呢？

古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有人认为，这是强调河流的变化，但我们又何妨把它理解为是强调了人的变化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物的特点，亦正是在这种富于动态的观照下构成了它万古常新的面貌。但愿本文的描述，将让人们看到一条新的中国现代文化之流，它只有起点与终点是人所共知的，而河流本身，则是另一副模样。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大潮起落，从启蒙到救亡	(1)
-----------------------	-------

I 在超越中突破	
——五四文学性质新探	(1)

II 失重与飘逝	
——启蒙主题的萎缩	(18)

III 悲哀的启示：《生死场》分析	
——爱国主义的民族化	(35)

第二章 互斥而不互动	(42)
------------------	--------

I 最初的灵光	
——个人主义时代	(42)

II 消失的地平线	
——疲乏与同化	(57)

III 宽阔的断裂带	
——两个极地	(76)

第三章 在倾斜中结合的智者与劳者	(91)
------------------	--------

I 从平衡走向倾斜	
——农民形象的崛起	(92)

- II 惊不破的桃源梦
 - 在城乡对立中呈现 (102)
- III 忏悔意识分析
 - 知识者的自贬、自责与自弃 (113)
- IV 民间形式中心论
 - 审美趣味上的农民路线 (129)

第四章 在自由与道统之间 (136)

- I 走出樊篱
 - 文以载道观的破灭 (136)
- II 徘徊在歧路
 - 左翼之左，右翼之右 (144)
- III 不变的原点
 - 现代文学品格特征两面观 (149)

余论 (154)

后记 (160)

第一章

大潮起落：从启蒙到救亡

I 在超越中突破

——五四文学性质新探

一.超越的成功

一九一五年，二十世纪的中国，破天荒地诞生了《新青年》杂志。四年以后，又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爱国学生反帝运动——火烧赵家楼。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谈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离不开《新青年》与火烧赵家楼。谈《新青年》，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是它领导了一场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面向世界。谈火烧赵家楼，是因为它是现代中国一次又一次反帝斗争的序曲。所谓的五四时代，就是由它们二者互补构成的。

那么，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新青年》与火烧赵家楼，到底谁轻谁重，或者是同样重要呢？

从流行的观点看，人们的线性思维特征表现在：既然五四文学是对五四时代的反映，五四时代的性质，就应当是五四文学的性质。中国的政治家们和历史家们就说过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的文学家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郭沫若就说过：“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

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①将五四文学与五四运动等同起来，固然没有全错，但是，文学与时代比较起来，难道没有它的自身特点吗？或者说，难道没有它对时代的选择吗？

其它，产生五四文学的必然性未必完全来自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五四文学同样会出现。五四运动只是五四文学成长的催生剂。五四文学的品格，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即经《新青年》的孕育，已初具规模，一批经过《新青年》洗礼的新作家和各色各样经过《新青年》培育的新观念与新情绪，正是它的标志。只是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这批带着新观念和新情绪的新作家，还未找到新的形象加以描写而已。所以五四文学的作家们，在谈到他们的早期思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新青年》是它们的母体。五四文学的主将鲁迅将他的文学看作是“遵命文学”，是倾听着“先驱者的将令”而创作的。其实哪一位五四文学作家的创作能够与《新青年》分离呢？用《新青年》文学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五四文学，也许更准确。

因此五四文学与五四时代的遇合，不是全面对应的，即五四文学并不是五四时代的全部现实的全息投影，它们遇合在文化层次上，而非政治层次上和时事层次上。文化层次，政治层次和时事层次是构成五四时期的全部现实，分别对应着人的文化心理、政治意识和现实行为。人的文化心理是五四文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五四作家的创作目标，亦是五四作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所以五四文学实际上形成了对五四运动的两个超越：一，虽然我们无法否认它与政治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超越政治（不是脱离政治），依然成为

^①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它的重要特色。超越政治，五四文学的表现领域才能相对集中于文化思想斗争之中，而不是党派政治斗争之中，从而形成了它作为五四时期思想斗争重要一翼的历史特点。二，超越了民族斗争。这赋予五四文学以世界主义眼光。对五四的许多作家来说，做一个古国子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即使愿意闭关锁国、抱残守缺，世界已将其巨手向它伸来并要撕裂它。迎接挑战，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民族问题并未在五四文学中消失，相反，它以更积极、更现实的方式出现，民族问题与世界不是隔绝的，而是动态的相互联系的。五四作家有时还在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但这种民族主义即非传统中国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主义，也非辛亥革命时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单纯排满的民族主义。五四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比较本民族与外部世界，以外部世界为基点，认同外部，改造内部的独特概念范畴。是华夏与整个外部世界相融合的世界主义。

从五四文学创作的第一批成果看，上述的结论并不错。《狂人日记》、《终身大事》、《沉沦》、《女神》、《惠的风》，虽然多姿多采，具体作品的意蕴不同，或解剖人物的病症，或抒发爱情的饥渴，或鼓吹反抗家庭，或主张个人独立，但构思的总思路却又惊人地一致：集中于表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期培养和激发中国人的自主意识、奋斗精神，首先从“心”的方面，完成民族文化的改造。

火烧赵家楼这一举世瞩目的壮举，没有在五四文学中留下它的光辉身影，点燃五四文学中反帝爱国的烈火般情感，更证明了五四文学的超越性的存在。据冰心回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她在北京，她曾感到过这个风暴的冲击，但到她来表现这一风暴时，这场风暴却已化为它的小说《斯人独